

# 伟大的信仰 伟大的选择

□ 高道国

近来看《刘胡兰》等革命影片,心灵又一次受到震撼和洗礼。

敌人多少次严刑拷打,刘胡兰没有出卖一名同志;敌人多少次威逼利诱,她丝毫不为所动。在生死考验面前,在财富诱惑面前,她都不改变选择,始终不放弃自己的信念,而这个信念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。

敌人问刘胡兰:“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?”她说:“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”。敌人又问:“以后你还会为共产党办事?”她毫不畏惧地说:“只要我还有口气,就要为人民干到底”。敌人敲起桌子嚎叫道:“你小小年纪,好嘴硬啊,难道你就不怕死吗?”刘胡兰逼进一步,斩钉截铁地说:“怕死不当共产党员!”

就是亲眼看到革命同伴被敌人用铡刀杀害,她依然视死如归,愤怒地说:“要杀就杀,要砍就砍,我死也不自白,共产党员你们是杀不绝的。”她高呼着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毛主席万岁!”从容地走向铡刀……死时仅十四岁三个月零四天,身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,刘胡兰因信仰而牺牲。

尽管刘胡兰的一生是短暂的,但是她的一生却是无比光辉灿烂的,她,历史铭记,人民铭记。她用一种信念,用一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爱国主义诗篇。她那血染铡刀、壮烈牺牲的一幕,至今撞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;她在铡刀前的慷慨陈词,至今在人们耳边回荡,她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共产党员精神与日月同辉。

“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”是毛主席对刘胡兰一生的概括。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。”毛主席说过,人总是要死的,但死的意义有不同。为人民利益而死,就比泰山还重;替法西斯卖力,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,就比鸿毛还轻。刘胡兰选择的就是为了人民,为了人民的解放,为了不连累乡亲,生死不屈,从容就义。原本该柔弱的小女孩,何以变成钢铁战士,刘胡兰的力量源自于伟大的信念,伟大的价值观。

“砍头不要紧,只要主义真。杀了夏明翰,还有后来人!”也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像刘胡兰一样的共产党员,有了共产党人的坚定

选择,才换来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,才有了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新中国。今天我们不仅要缅怀先烈,更要时刻学习弘扬他们的伟大精神,学习弘扬他们为了挽救民族危亡,为了救亿万民众于水火之中而英勇顽强、坚贞不屈、慷慨赴死的大气概。

“虽千万人,吾往矣。”九十年来,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抛头颅洒热血、前赴后继争取了民族独立,更是以时不我待、只争朝夕的紧迫感,以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,以舍我其谁、敢为人先的大气魄,开创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。

一切伟力,源自于信仰,信仰是九十年来的动力、支撑,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竭源泉。



# 睡在乡村的草垛

□ 钱国宏

金黄的草垛码在乡村里,如一个个弥漫草香的梦境,植入秋天的深处;又如一枚枚硕大的太阳,流淌在村庄的血管里。

草垛是庄稼人眼中一道平素的风景。夏季歇凉的时候,男女老少喜欢坐在草垛旁边,嗅着清清的草香,侃些乡土轶事;晚饭后,草垛旁人头攒动,笑语声喧,劳累了一天的乡亲们围坐在一起,谈论一些家事国事。谈着谈着,便有疲惫的汉子沐浴着清冷的月光,枕着干草,酣然入梦;放学孩子,喜欢搬个小板凳,围在一起写作业。作业完成后,草垛便热闹起来,孩子们把这里当成了战场,你上我下地相互追逐、打滚,喊杀阵阵,却又不见硝烟,个个脸现红光,额头沁汗——与干草这样的植物亲近,通体康泰!

草垛是乡村版面上发表的头条新闻。秋收过后,稻草被扎成捆,一列列码在空旷的田野里,沙场秋点兵。秋阳如烈酒,几天的工夫就把草捆晒出足金的成色,套上车,拉回村,码成垛。在农家院里,堆草垛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颇有讲究的技术活。父亲生前是把堆草垛的好手,经他手堆的草垛结实,棱角分明且不蔓不枝,任你上面滚上几个来回也不会“滚包”、倒塌;也好看,远远望去,竟有着《几何学》中圆锥体的优雅弧线。夕阳中,草垛披一身霞光,静静地卧在村庄里,流光溢彩,庄严肃穆,任画过《干草垛》、《睡莲》的法国著名画家莫奈也会心醉神怡。

草垛是乡村最终的归宿。在北方的乡村,老人做了古,都要埋在草垛旁或接近草垛的地方,坟头上还喜欢放一把干草。这种风俗里蕴涵着深深的寓意:与青草相濡以沫的农人,一代又一代,都不会离开青草,离开植物,这是一种宿命,更是一种继承。先人走了,后人会主动接过先人的土地和农具,接过先人的性格和期望,把平凡如稻草的日子一层层堆高,码实。

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。”前不久回老家,一进村口,就看见了散落于街巷的大小、高高低低的草垛,它们如一枚枚音符,歌唱着乡村,歌唱着五谷轮回。公鸡叫了,草垛醒了,灶膛亮了,炊烟高了,太阳红了……多么朴素清新的早晨,多么宁静温馨的日子!在这如诗如画的空气里,草垛,像一位将军,指挥着乡村风尘仆仆,一路向前——草垛前面,是一张张朴实的笑脸;草垛后面,是一片片和谐的家园!

# 父亲

□ 杨峰

父亲因患贲门癌及肝癌,终医治无效,走了。这位老教师没有留给我房子和多少金钱,却留给我一生享不尽的精神财富。

在老人家面前,我这个“知名法官”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

叔父讲,我父亲年轻时在淮阴读书,从老家建湖西到淮阴,要从阜宁绕到益林再到淮安近200公里,父亲从来总是将祖母做给他的布鞋塞在大腰布上,而光脚步行走上两天一夜,舍不得跟一次帮船,夜晚就在路旁农家抱点柴禾借宿。建国初的师范虽系国家供给制,但供应粮很少,根本吃不饱,许多师范生都吃不了苦而跑回了家,而父亲却强忍下来。

毕业后,父亲被分配在盐城任教,每月工资25元。父亲每月除留下最低标准的吃饭、理发、洗澡钱外,要带20元钱回老家赡养祖父母、扶持姑姑、抚育子女!当祖父重病期间,他毫不犹豫地输了500毫升血;祖父去世时,他毅然脱下了唯

一象样的中山装,为祖父穿上。

从我记事开始,就发现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、呕心沥血,从来没有假期,也从来不知疲倦。每天天不亮,他就为我们掖好被子,披上破中袄早早地去办公室办公;夜深了,他还在烛光下逐字逐句地批改学生作文……

我初中时,成了父亲的学生。我亲眼见父亲在讲《卖炭翁》、《石壕吏》时,动情处跺脚时那强烈的感情;我亲眼见父亲带领我们“开门办学”时,手执劳动工具教导我们怎样向工人、农民学习的情景;我清楚地记得一位海军营长学生看望父亲时赠送父亲的《毛主席诗词》,而父亲特地翻遍全身去饭店切回的三角钱香肠……

父亲长期任学校教导主任,手中掌握一定的权力。而每当其他教师生病、请假时,父亲总是无声地去代课;每当有学生家长为父亲帮助他们而登门表示谢意时,父亲总是婉言谢绝……

由于家里子女较多,父亲节俭衣食,却从来不刻薄我们。困难时期,父亲总是到农村田头以极低廉的价格,挑回来小山芋、萝卜、胡萝卜头子给我们充饥,甚至挖野菜切碎搅在很少的米中煮饭让我们吃饱;春节了,父亲都是与母亲一道到轧花厂买来打包布回家洗净,去染坊染成各种颜色,让我们能够穿上新衣服;而父亲晚办公回来,宁肯喝冷水,而不愿动一口第二天的早饭;临近中秋,父亲为了让我们改善伙食,竟还下到刺骨的大洋河里为我们摸河蚌……

1994年,我考进了当时的盐城市郊区人民法院。进法院前一天,父亲说,我只叮嘱你一句:法院是清水衙门……

多年来,我一直为两件事而懊悔不已。在我小时候,父亲每天下午都要抽空去很远的河边挑上好几大担水回家,肚里没食的父亲常挑得脸上发白。有一次我发现父亲挑水前,在铁锅里用萝卜头汤泡了半碗饭,我竟偷着一下子铲到嘴里一大半,而父亲挑水回来却没抱怨一句。1976年我高中毕业时刚满16岁,当我要到九里窑河北的桥梁工程队做工时,父亲拿出他唯一穿得出去的大半新涤纶裤子交给我说:拿去改改穿吧,出门要像个样子。而不懂事的我,竟然没有说一个“谢”字。

父亲走了,此时,有一句歌词最能表达我的心情:央求你啊,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!



# 大纵湖 副刊

# 蟒蛇河记

□ 许正和

“一条大河,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

这不是那只几乎尽人皆知的电影插曲吗?是。然而,少年时代的我,却固执地将这“一条大河”看作咱家乡的蟒蛇河。我生在龙冈,一个紧挨着蟒蛇河的江北小镇。镇子不大,估摸和江南的周庄、同里差不多。镇子外围,蟒蛇河两岸的大片农田里,便有稻菽千重浪,便有农人下夕烟。少时顽劣,曾经和小伙伴偷偷解开渔人系在河边的“鸭溜子”(放牧鸭、鸭用之小舟),在蟒蛇河中任意游荡,沉迷于往来船只上的艄公号子和片片白帆。汽笛一声,轮船来了,掀起层层清波。虽说小“鸭溜子”被撞击得团团转,却又乐翻了。一伙手忙脚乱的少年郎。

那时节,并不晓得蟒蛇河源自大纵湖,也不晓得她的尾闾在县城边连接串场河、新洋港而东流入海,更不晓得她在浇灌、泄洪、水运等方面的巨大作用。只晓得镇上人家的“吃水”总是由挑水的汉子吭哧吭哧从“大河边”一担一担挑回来的,只晓得母亲总是到“大河边”淘米、洗菜、汰衣服的,只晓得有不少人家的“新娘子”是从蟒蛇河里带有敞棚的木船上接到镇里来的。还有“柳堡的故事”——“拍电影呢,快去!”“在哪块哟?”“镇子东头的大河边上,李进、二妹子都在呢!”于是乎,大多剃着“光头”的大、小男孩们便一窝蜂地沿着蟒蛇河边的砂石路跑去瞧热闹了。读书了,龙冈中学的校歌里也有提及:“蟒蛇河畔,龙冈山上,龙冈中学书声朗朗……”

龙冈镇边的蟒蛇河上有一座不知道始建于哪个朝代的凤凰桥。是因为河面宽阔吧?

不大可能像赵州桥那样建成拱式的;是因为有舟楫频繁通行吧?也不适合像苏州的宝带桥那样建成平贴水面的。凤凰桥是纯杉木构架的,朴实无华。在我的记忆中,凤凰桥至少曾修缮过两、三次。后来,木质改成了钢筋混凝土,位置也向西作了挪动。少时便听到了关于此桥的一些传说,大抵讲的是桥刚建成时,便有凤凰来栖,后在桥南的南弥陀律寺上空飞过,故而得名。关于蟒蛇河的传说更多,其中之一说的是:某年,朝廷派了一位白胡子大臣来负责开挖此河。总是有着某种导因吧,工程竣工的前夜,大臣派军士横向在河道中插下了一百零八把大锹。次晨一瞧,大锹下却有一条断了身的巨蟒。因之,这条河从此就被称作蟒蛇河了。讲者津津乐道,听者津津有味,而后一同抚掌欢笑,孩童总会如此。

很多事情,是在成年之后一点一点知道的。

清初,里下河地区水患频发。康熙二十六年(公元1687年),一位高官由北京风尘仆仆来到了淮、扬一带,“先经履勘”,而后向朝廷提出了“筑高不如就低”、“施工以冈门(龙冈的旧称,取沙冈门户之意)镇为最先,次白驹场,次丁溪场,次草堰”的方案,为康熙皇帝批准,并“铸监修(里)下河工部印授之”。有了万岁爷的圣命,高官当然就得大干一场了。白日里,他是否整日在疏浚工地忙个不停呢?有辰光,他是否卷衣擦袍和军士民夫们抬上几筐泥土呢?闲暇了,他是否会到冈门“工”字型古街逛上一逛呢?晚上,他是睡在冈门工地的简陋床铺上呢?抑或去十八里路以外的县城馆驿里安卧呢?不得而知。《清史稿》卷

279记载,这位高官名孙在丰,浙江德清人,康熙九年一甲二名进士,官至翰林院学士,兼工部侍郎。《清史稿》中对施工的详细情况没有记载,却记下了清代治河名臣(小)于成龙对康熙皇帝当面奏报的“在丰监修下河,万民欢颂”的字样。

那传说中的白胡子大臣是否指的就是孙在丰呢?抑或(小)于成龙?说不准的。但是,堂堂朝廷高级官员的名字和具体一座江北小镇,一项水利工程联系在一起,于今天的龙冈来说,恐怕是唯一的。其实,在孙在丰之时,朝廷内部对于治理里下河水患问题一直存在着堵与疏的激烈争议。孙在丰最终败北,被降职,在翰林院的漫漫书卷气中,苦度残生。康熙二十八年,孙在丰卒。然而,青史毕竟记载了他,受惠于他的后人也不应该忘记了他。

孙在丰身后,历史又匆匆行走了三百余年,堵与疏的矛盾淡化了,污染和治理的矛盾又突出了。公元2009年,蟒蛇河又一次意外地吸引了世人的眼球——那便是一次遭万众唾骂、又实在不该忘却的水污染事件……于是,有了沿河化工企业的悉数迁移,有了更严格的水政监察,有了蟒蛇河取水口的上移,有了龙冈的盐龙湖……

如果说,我们把串场河看作800万盐阜地区人民的母亲河;那么,蟒蛇河则无疑是今盐都区和市区近200万人民的母亲河。如果说,我们对串场河有“上得了厅堂”之喻,那么蟒蛇河则肯定该是“下得了厨房”的吧?

让我们一道,爱我们敦厚的、朴实的母亲河——蟒蛇河吧!